

王开林 著

# 隐士

人生无路可走或歧路纷出，都会令人抓瞎和抓狂。  
人想做隐士，有的人在迷途上越走越远，直至坠  
可测的渊谷，万劫不复。

# 隐士

王开林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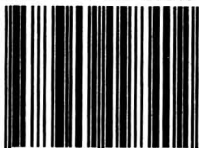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隐士/王开林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3. 8  
(微阅读大系·王开林晚清民国人物系列3)  
ISBN 978-7-309-09840-2

I. 隐… II. 王… III. 名人-人物研究-中国-近代 IV. K820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51165号

ISBN 978-7-309-09840-2



9 787309 098402 >

隐士

王开林 著

责任编辑/李又顺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 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山东鸿杰印务集团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875 字数 93千

201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 100

ISBN 978-7-309-09840-2/K·431

定价: 20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目录

- 自序 一条道走到黑 / 1
- 康有为 保皇之路越走越黑 / 7
- 杨度 误入歧途的大才子 / 41
- 刘师培 越堕落越不快乐 / 79
- 周作人 隐士与叛徒 / 107
- 冯友兰 为天地立心 / 139

## 一条道走到黑（自序）

一个人一生中可能会面临两种精神困境：眼前无路可走是一种，眼前歧路纷出则是另一种。这两种精神困境都令人抓瞎和抓狂。对于找不到北的路痴而言，歧路纷出的情形还要更为糟糕一些。

在中国近现代，知识精英几乎都曾遭遇过这两种精神困境，有的最终找到了出路，或自以为找准了出路，有的则在那条迷途上走得两眼晕黑，直至失足坠入深不可测的渊谷，万劫不复，但也有人历尽劫波，找到归途，实现了自我救赎。

康有为著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，组织强学会，都是为维新变法作必要的理论准备和干部储备。他以“素王”（有王者之风，而无王者之位）自视，国人也以当世之大儒

待之。他若看清形势，抓住时机，集结一切可以集结的社会力量，顺乎天而应乎人，戊戌变法又何至于百日夭亡？他玩小臣架空术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癫狂操切，疏远中间派，激怒满朝文武，甚至异想天开，罔顾实力对比，企图发动宫廷政变，不愆（fèn，毁坏）事，不败事，才真叫奇怪了。康有为逃至海外，利用华侨的同情心，大肆敛财，他允诺资助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，却食言自肥，致使二十多位同志白白牺牲。1917年，康有为不顾人心向背，支持张勋复辟，连他的大弟子梁启超都看不过眼，骂他为“大言不惭之书生”。在清朝末期，康有为确实抓到过一手空前绝后的好牌，却打得极烂，输个精光，很难令人释然。

杨度满腔热血，仗义慕侠，作《湖南少年歌》，高呼“若道中华国果亡，除非湖南人尽死”，但他误入歧途，拜王闿运为师，修炼绝艺帝王学，奉之为金科玉律。时代变了，人心变了，国民对共和充满向往，袁世凯逆流而动，称帝就等于玩火自焚。杨度试图改造帝王学，使之成为君主立宪的幌子，他找到美国博士、中国通古德诺来操刀主庖，也无济于事。杨度坚信强梁中的强梁、猛人中的猛人袁世凯，能够将老牛破车旧中国拽出烂泥潭，其后，他轻举妄动，组织筹安会，终于万劫不复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急功近利乃腐心蚀

骨的毒药，他不幸中招了。杨度昧于大势而踏上歧途，结局黯淡不能算冤屈，梁启超、孙中山都曾高看他，视之为一流的宪政人才，轮到抉择时，他却弃共和，挑君主，与狼共舞，迷信强人专制，其宪政理想也就化为了梦幻泡影。

刘师培是另一种典型，他有出众的天资和学问，少年成名，得到过章太炎的赏识。在日本，他改名为“光汉”，以“光复汉室”的抱负骄人，信奉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，终因脚底无根，心中多欲，叛离同盟会，倒向清朝大臣端方的怀抱。端方在四川被杀后，刘师培受了惊吓，进了牢狱，并未吸取教训，后来又参加筹安会，为袁世凯称帝做吹鼓手，弄个参政的头衔，享受官福，讲究排场。刘师培自甘堕落，有人为他脱责，将几笔烂账悉数归在他老婆何震名下，这很不公平。蔡元培曾致书吴稚晖，分析刘师培中途颠蹶（diānzhì，被东西绊倒）的原因，称他“确是老实，确是书呆”，“未免好用其所短”，甚至不惜用最好的善意猜测刘师培，他投靠端方是想效仿徐锡麟，先做卧底，再伺机起事。这纯然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。某些知识精英满腹经纶，书读得太多，结果脑袋不再是自己的了，刘师培就是这种典型。他走上歧路，是方向感太差，也是主见不明，被欲望穿住牛鼻子，精神已不得自由。

周作人要做北平的隐士，要做儒家的叛徒，这样的想法原本不赖。抗战期间，隐士不肯挪窝尚可理解，叛徒要投靠日寇就令国人难以接受。他辩护自己出任伪职是受命做卧底，他的贡献是保全了北大文学院和北平图书馆，救助了不少进步人士，但在很长时间内仅有寥寥数人愿意为他出具证词。周作人被日本文化所化甚至超过了被中国文化所化的程度，这朵“向日葵”不幸生活在那个中日交战的年代，尽管他没有作恶害人的主观故意，却与狼共舞，他走的歧路通向地狱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周作人饱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，他的遭遇和结果远比康有为、刘师培更为悲惨，他被定性为“文化汉奸”，乃是最难洗脱的耻辱烙印。

冯友兰是一位儒者，他有可能成为大儒，也有可能成为犬儒，多一点污迹就是不一样。他具备做大儒的资质，也有追求天地境界的宏愿，但他的弱点是：在逆境中，在高压下，只能“顺着说”，从被动迎合到曲学阿世。在非理性的年代，知识精英惨遭折磨和侮辱，落水凤凰不如鸡，这种悲剧见者有分。如果说“文革”的那条歧路是知识精英不得不走的绝路，冯友兰的遭遇是值得同情，应该原宥(yuán yòu, 原谅宽恕)的，毕竟他是在一台巨型绞肉机中寻找保命的缝隙。他被迫做犬儒，宿命难逃，他不曾抗争，这固然令人遗憾，他没有自杀，



则不应受到苛责。冯友兰可贵之处是在耄耋高龄重写七卷本《中国哲学史》，把往日被迫颠覆的观点扳正过来，把未曾表述过的思想作明确痛快的表达。

真诚地忏悔和改过，这并不是中国知识精英的习惯动作。他们歧路亡羊，丢失的可能是良知，是人格，是思想，也可能是机会，是成果，是荣誉，不管是什么，真正的智者都应该像冯友兰那样，只要一息尚存，就实行自我救赎，尽可能将“亡羊”找补回来。



康有为

# 保皇之路越走越黑

康有为以势利为先，以谎言为饰，不仅多求多欲，而且口是心非，历史却故意出幺蛾子，将他钦定为第一人选，去主持19世纪末的变法维新，真是可悲可叹！

翁同龢一生写日记数百万字，朝野名士罕有从其笔端挂漏的。他出生于豪门望族，状元及第，又是两朝帝师，地位非凡，且为人谦冲开明，进入其视野和客厅并得到他激赏提携的多为同时代的优秀人物。然而直到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康有为仍然迟迟未能进入翁同龢的视野。康有为却在《自编年谱》中言之凿凿地说，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他就进京拜见了翁师傅，并向后者当面讲述了俄国彼得大帝、日本明治天皇变法改制的故事，翁师傅如闻天音，茅塞顿开，大为悦服。往好里说，这是他误记所致，往坏里说，就是他存心造假。

康有为略显木讷，口才远非一流，梁启超极口夸赞康有为的演讲“如大海潮，如狮子吼，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，使之悚息感动，终身不能忘”，未免言过其实，但他确实凭借演讲倾倒过华侨美女和才女何旃（zhān）理，使她成为了自己的三太太。康有为会吹牛，“夫天不欲平治天下，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”，此类大话讲足几箩筐，倒

是稀松平常的。翁同龢是在朝的清流派掌门、主战派领袖，长期出入宫禁，坏消息听得太多，眼见国势江河日下，难免忧心如焚。按理说，康有为口口声声强调变法图强，他的主张应该很容易打动翁师傅，事实则不尽然。

在日记中，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评价常用“狂甚”二字，这个“狂”字用的到底是褒义，还是贬义？值得读者思忖。在翁师傅看来，康有为汲汲于功名，只是想攀爬到更高的平台上去猎获荣华富贵。历史学家高阳作《翁同龢传》，仔细比对过《翁同龢日记》和康有为的《自编年谱》，充分考虑了翁同龢为避祸删削日记的可能性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康有为志大言夸，惯于攘夺和作伪，公然欺世，毫不惭汗，康有为屡屡言及翁同龢如何如何赏识他，只不过是虚构故事，谬托知己。高阳说：“……且以康有为之言行而论，与翁同龢忠厚和平、谨守世俗礼法、不喜与人忤（wǔ，不顺从，不和睦）的本性，如水与火之不能相容，故可断言：翁同龢绝不会欣赏康有为。”翁同龢最青睐最信任的人是汪鸣銮和张謇，状元张謇尤其出色，被他赞为“霸才”和“奇材”。汪、张二人都与康有为很少交集，这也可以反证康有为是剃头挑子一头热。

翁同龢不欣赏康有为，并不意味着光绪皇帝就对康有为

的欺世大言具有超强的免疫力。自古以来，衣褐（hè，粗布或粗布衣服）怀宝之士上书给深居九重的君王，实堪称顶尖级的行为艺术，图虚名则绰绰有余，求实效则迢迢不及，康有为原本玩的就是心跳，四年之间七次上书，弄个名满天下或谤满国中都不足为奇。其万言书内颇多狂悖之语，例如“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”，“不忍见煤山前事”，秦二世临死前乞求做黔首（老百姓）而不可得，明崇祯皇帝于城破之际跑到北京煤山（今景山）上吊，康有为用这两个亡国之君的典故说事，以增强其万言书的惊悚效果，光绪皇帝对他大逆不道的胡话倒是颇为优容。草野书生康有为不顾死活，畅所欲言，其主旨（“养一国之才，更一国之政，采一国之意，办一国之事”）确属立国的大本大原。

翰林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皇帝保举通达时务人才，特荐五人：康有为、黄遵宪、谭嗣同、张元济、梁启超。正是这位帝师郑重其事的奏折对康有为推崇备至：“忠肝热血，硕学通才，明历代因革之得失，知万国强弱之本源。当二十年前，即倡论变法，其所著述有《俄彼得变政记》、《日本变政记》等书，善能借鉴外邦，取资我用。其所论变法，皆有下手处，某事宜急，某事宜缓，先后次第，条理粲然。按日程功，确有把握。其才略足以肩艰巨，其忠诚可以托重任，并世人才，

实罕其匹。”世人多附会，加上以讹传讹，想当然认为帝师翁同龢讲过的美言，其实出自另一位帝师徐致靖的笔墨。光绪皇帝身居九重，两眼一抹黑，他读了徐致靖的奏折，一定欢欣鼓舞，变法维新，事在人为，既然狂生康有为与众不同，举世无双，或许真就是那把能够掘开冰川的利镐。

我欲望鲁兮，龟山蔽之。

手无斧柯，奈龟山何！

据东汉名士蔡邕的《琴操》所记载，这首《龟山操》是孔子所作，意思是：“我想要眺望鲁国，龟山遮蔽了它。手中没有斧柄，拿龟山怎么办？”孔子退而忧念故国，以龟山蔽鲁比喻奸臣季桓子一手遮天。诗中的“斧柯”可释为“权柄”。男人不可一日无权，无权则处处遇阻，事事受欺。孔子感慨鲁国政治黑暗，百姓贫苦，要诛灭季氏，却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康有为做梦都想进入清王朝的权力中枢，实现救国抱负，他对“手无斧柯”的感受同样深刻。



## 从草堂授徒到公车上书

康有为并非一帆风顺，他走过一段霉运。科举之路窄得可怕，也黑得可怕，他扑腾多年，其路径是：考秀才，三战皆北，总算取得了监生的资格；考举人，六试不捷，心都考（烤）成了灰。清代科场流传一句谚语，“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功五读书”，可见运气之重要，学问之次要。康有为屡试不中，内心受到莫大的刺激，早已对现实郁积了一腔孤愤，这种人无疑最想改变现状。奇就奇在，名落孙山也会坏事变好事，他从八股制艺中匀出心思，钻研传统学问，面壁之功殊非浅显。当时，理学大儒朱次琦，人称九江先生，笃守程朱，力求实践，是羊城首屈一指的大学者，康有为出入其门垣，求益问字，但算不上正宗的弟子。后来，他上书权贵，动辄自称“侍九江之经席”，巧妙地打出“擦边球”。简朝亮是朱次琦的入室弟子，瞧着康氏矜夸十分别扭，就公开讥消后者“游僧托钵”。

不管怎么讲，康有为的瞽学功夫确属一流，从理学到佛学，从经学到西学，不过数年间，就已融会贯通。康氏屡次上书，言词激烈，虽然未获朝廷认可，但已名动九州。一俟